

1958年新民歌运动述评

李巧宁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9)

【摘要】1958年,中国城乡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人人写诗,处处赛诗。应该说,这场新民歌运动是大跃进的一部分,是文艺大跃进的具体表现之一,又是大跃进的鼓乐手,以民歌的方式宣扬跃进行为。在内容上,新民歌一方面竭力歌唱各条战线的跃进形势以及群众的劳动豪情,另一方面歌颂党、领袖和新中国。

【关键词】新民歌运动;大跃进;社会主义歌咏运动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7)02-0032-05

1958年,中国到处洋溢着“大跃进”的热潮,农业、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各个行业的运动接连不断,在一片“全民大办”的呼声中,各种“卫星”竞相上天。在这些运动与热潮当中,新民歌运动以其人人参与的广泛波及面和浩大的声势而颇为引人注目。对此,时人这样描述:“1958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工农兵自己写的诗大放光芒。出现了无数诗歌的厂矿车间;到处皆是万首诗乡和百万首诗的地区;许多兵营成为万首诗的兵营。……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部动手写诗;全部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1]这一“轰轰烈烈”的运动不仅折射出1950年代后半期的时代精神,而且是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然而到目前为止,围绕这一运动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却是极为有限的,除了少数几篇从文学角度对新民歌进行艺术分析的成果之外,就笔者所知,还没有一篇从历史学的视角对这一运动进行全面勾画和分析的作品。鉴于此,本文拟在广泛阅读1950年代尤其是1958年的报刊资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学的视野对新民歌运动做力所能及的学理性分析。

一 新民歌运动是大跃进的一部分——文艺大跃进

1958年春,随着大跃进在各个生产行业的展开,中共中央同时要求文学艺术能与新的形势相适应而大大地发展起来,即在文艺领域掀起一个大跃进。当时,在中共中央看来,文艺最大限度地跃进的最快方式莫过于走群众路线,搞群众运动了,即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的群众集体创作文艺。正如时人所说:“大搞群众运动才能多快好省”^[2]。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的口号。

在这种情况下,1958年4月1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指出,收集“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生产建设的波澜壮阔的气势,表现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高涨”的民歌“对于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首先是诗歌和歌曲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对此,当时主管文化工作的周扬有进一步的阐释:“全面搜集民歌及其他民间文学艺术,是一件必须全党、全民动手的工作,同时必须动员和吸引全体文艺工作者来参加这个工作。……今天的民歌,是新的农民、工人、士兵的作品,……它们正像黄河、长江一样,以汹涌澎湃之势,对新诗起着冲击的作用,必将使新诗的面貌为之改观。群众诗歌创作将日益发达和繁荣,未来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将会源源不断地出现,他

收稿日期:2007-02-05

作者简介:李巧宁(1971-),女,汉族,陕西眉县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史的教学与研究。

们中间的杰出者将会成为我们诗坛的重镇。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诗人之间的界线将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所共赏。这样的时代不久就会到来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需要一个大革新,大解放,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来实现这个大革新、大解放,现在正是时候了。”^[3]之后,全国各地纷纷组织人力开始采风,唯恐行动不够得力,唯恐采集的民歌不够多。为了多出诗歌,多出诗人,许多地区极力鼓动群众创作民歌,向群众布置写民歌的任务和指标,甚至要求“人人是诗人”、“村村有诗人”、“村村要有王老九,社社要有李有才”、“每县出一个郭沫若”等;更有一些地区为了使新民歌运动轰轰烈烈,大搞赛歌会,按每个群众在赛歌方面的表现来评定其阶级觉悟:表现得越积极,说出的语言越充满豪情壮志,就被认为越有社会主义觉悟。

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再鼓动,使许多基层单位把创作民歌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人们普遍以一种民歌越多越光荣的心态疯狂地编写,不顾质量,只管数量。在全国范围内,不仅省与省、县与县之间比创作速度,而且乡、合作社、生产队广泛组织“赛诗会”、“民歌演唱会”、“新民歌联唱会”、“诗歌展览会”等,就连家庭成员之间也展开写诗竞争,“全国有许多地方都形成了‘千人唱,万人和’的诗歌创作局面,小到十几岁的孩子,老到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参加了民歌的创作和演唱”^{[4] (P12)}。这样的诗歌创作阵容可谓史无前例!在群众一拥而上的创作形势之下,新民歌成批地被生产出来。时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景象:“在大跃进高潮中,往往出现这样的事情,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就使一座城市变成了诗城。街头巷尾,机关商店的里里外外,到处都贴满了诗,挂满了歌……”^{[4] (P9)}也难怪当时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诗歌县、诗歌乡、诗歌社。请看1958年11月人民日报记者对被称为安徽省“诗歌之乡”的巢县司集乡的报道:“每家的墙壁上,村口的土坊上,都写满诗歌和画幅,汽车路两旁用白石子垒的是诗句,在有些屋顶上、远远的山坡上,也都有诗句”,“司集乡群众现在创作和歌唱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了,石桥社的社主任张春政五个月来已创作了九百多首诗歌,他计划今年要创作一千五百首到两千首,其他乡社干部和

群众,也人人都有一个惊人的创作计划,全乡今年要向创作百万首诗歌的目标奋斗”。^[5]批量生产的民歌不仅遍布乡野,而且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报刊上。在1958年,几乎所有的报刊都竞相刊登新民歌(不仅有各级党报党刊,而且有文学性极强的专业刊物),以表达对新民歌运动的热情支持。此外各地还以正式出版或非正式印刷的方式发行了不计其数的民歌专集。新民歌被这些刊物称为“跃进战歌”、“最好的诗”等。

二 新民歌是主流意识的鼓乐手

1956年中宣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之后,文艺界迅速热闹起来,尤其是通俗文艺如歌曲等一时间“百花齐放”;除了建国后大力推广的歌颂新中国、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的昂扬歌曲之外,一批抒发愁情的哀怨歌曲和都市浪漫曲在群众中风靡起来,如《何日君再来》、《处处吻》、《卖相思》等。然而后一类歌曲与主流意识所竭力宣扬的豪迈、坚定、无私献身的社会主义精神极不相称,尤其是到了1958年,已成全国之势、遍及各个行业与领域的大跃进要求人们把所有注意力投注到“大干”、“苦干”中去,而这类歌曲却恣意地抒发着人们内心与“大干”、“苦干”毫不沾边的“小资产阶级情感”。于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这些歌曲先后被贴上“反动歌曲”、“黄色歌曲”的标签而受到批判。为了彻底消除这类歌曲在群众中的影响,中共中央和新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尽快生产出能反映社会主义思想感情、鼓舞生产劲头的“红色歌曲”来占领音乐市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58年春季开始,全国掀起了一场社会主义歌咏运动。

搞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歌咏运动,就需要有大量充满豪情壮志的社会主义歌曲。靠专业的音乐工作者来谱写似乎难以满足要求,一是数量不够;二是不一定通俗,因而难以在广大群众中流行开来。用当时的话语来表述,就是“过去从事社会主义歌唱运动,有些地区比较习惯于一种单纯依靠专业创作、单纯依靠少数专业工作者向群众辅导的从上往下贯的方式,比较少考虑到依靠群众、解放群众创造力的问题。……这实质上是一个是否相信群众的问题,也是一个路线问题。不走群众路线,结果便会束缚群众的创造力,增加音乐的神秘感,

……使运动变成冷冷清清，少慢差费；或者是专家来了轰轰烈烈，专家走了烟消云散，即使培养了几个骨干，也不能满足需要。为了发挥六亿人民的巨大创造力，目前提倡一个‘学民歌，编民歌，唱民歌’的运动是适宜的，这个运动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歌唱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6]。于是，新民歌运动成了社会主义歌咏运动的一部分。

的确，民歌这种来自民间的、语言通俗活泼的文艺形式对社会主义歌咏运动再适合不过了，它本身在叙事、表达情感方面具有的简单、宏观的特点，既能使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很直白地宣泄出来，使其在民歌这种“民间的”、“俗的”、“大众的”文艺形式下得到名正言顺的宣扬，又因为它的亲和力而使群众很容易对这种精神产生认同感。就如有的学者所说：“民间文学的简约和直接的原则的确迎合了总体化权力建立起来的主流话语的基本原则。所谓的宏大话语必须清除一切异质的、深邃的或隐晦的言辞风格，才能确定其自身的有效性。复杂成为总体性话语的最大威胁，因为它会揭示各种困难、不可能、不协和、非逻辑、无理性、错迁、逆反、缺憾、怀疑，等等。而主流的宏大话语所需要的是信念、肯定、同一性、理性、规律，等等，以维持权力的生命。”^[7]

同时，随着大跃进的全面展开，搜集民歌的必要性随之变得紧迫：不仅需要民歌来占胜“黄色音乐”，宣扬社会主义精神，而且需要它们来使大跃进的号角更加响亮、强劲。因为大跃进要求于人们的超常劳动、超常热情、超常干劲，需要具有超常想像力的文艺作品来营造与之相适应的气氛，从而鼓舞人们的干劲和热情。为此，只有掀起一场新民歌运动，鼓动群众大胆地、超常地发挥想像力，创作能反映跃进精神的新民歌。

民众果然不负众望，在党的政策的引导之下创作了大量的超现实主义但却符合跃进潮流的作品。比如，当各地农作物产量竞放卫星时，就有类似“男女老少齐动员，定把旱地变水田，不怕累不怕苦，争取多种高产物，破保守赶跃进，实现亩产一千斤”^[8]的民歌；当中共中央倡导各地大办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时，歌唱公社和食堂的民歌就涌现出来：“自从办食堂，人人喜洋洋，一齐去劳动，再不瞎嚷嚷，社员团结好，年年多打粮，感谢毛主席，出的好主张”^[9]；“东风吹透百

花开，公共食堂人人爱。集体生活就是好，它给咱带幸福来。感谢党的总路线，好比明灯放光彩，集体主义无价宝，传给子孙万万代”^[10]。当轰轰烈烈的大跃进需要动员女性走出家庭，成为有效的社会劳动力时，表现女性劳动豪情的民歌就纷纷亮相，如“侨家妇女出绣房/月当太阳夜也干/新打锄头当绣针/要给大地绣花毯”，“新娘子，刚过门/脱下红鞋下田园/挑起肥料猛似虎/插秧又直又像样/夜夜教人学文化/真是能干大嫂娘”，“妹啊妹/当代木兰是我妹/开山筑路修水库/模范红花我妹配”，“刘大娘，真能干/田里忙来灯下忙/白天修路车子化/夜学文化扫文盲”等^[11]。

这样的民歌，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勾画出的人们劳动的豪情、快乐，无疑能给人以鼓舞——强化对新社会的热爱与对现行政策的拥护，树立以苦为乐的精神，从而提高劳动的热情。正如当时的新民歌所唱：“如今唱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别看都是口头语，搬到田里变米粮”^[3]；“山区人民爱唱歌，……唱得秃山栽花果，唱得河水上山坡，唱得水土跑不了，唱得早井比星多；唱得牛羊满山跑，唱得清水过沙漠；唱得农村建工厂，唱得亩产千斤多；唱得摘掉文盲帽，唱得四害见阎罗；唱得铁牛来耕地，唱得山沟变金窝。山歌越唱劲越大，改天换地英雄多。随着歌声过黄河，塞上要唱江南乐”^[4]（P44）。豪情，总是易于使人热血沸腾；欢乐，总是那么蛊惑人心。豪情万丈、欢快无比的新民歌所具有的煽动力之大是可以想见的。难怪时人这样说：“在 1958 年，民歌在各种战线上各项工作中，都是一面‘战鼓’。”^[4]（P43）

三 新民歌的主要内容

由于新民歌运动既是大跃进运动的产物，又承担着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使命，因此它的主要内容必然紧紧地与时势的需要联系着。一方面，新民歌竭力歌唱各方面的跃进形势以及各条战线群众的劳动豪情；另一方面以歌颂党、领袖和新中国为主要内容。在展现各条战线上的跃进气象和群众的劳动豪情方面，新民歌发挥了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农业跃进和大跃进形势下的农村新面貌是新民歌描绘最多的对象。仅 1959 年周扬、郭沫若编辑的《红旗歌谣》收录的 300 首民歌中以农业、农村为主题的就占到二分之一以上（172 首）。且看

新民歌语境下的农业：“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乱转转”^{[4] (P23)}；“地翻三尺产量高，一棵玉米穿云霄；彩云拴着玉米腰，吓得月亮弯弯腰”^{[4] (P24)}；“稻粒赶黄豆，黄豆象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象山芋，山芋超冬瓜，一幅丰产图，跃进农民画”^{[4] (P218)}。新民歌中的农村面貌更加喜人：“社里机器响，社员取衣裳，缝衣拿进厂，取回新衣裳，做工又美观，生产喜洋洋。”^[12]除此之外，新民歌还大胆地展示了各行各业群众的劳动豪情：农民“干劲真是大，碰天天要破，踩地地要塌，海洋能驯服，大山能搬家，天塌社员补，地裂社员补”^[3]；辍工“脚踏云，头顶天，盐场在我脚下边，空中抡大斧，白雾缠腰间。不怕风雨不怕寒，哪管打霜落雪天！千百杉木抡手里，立起天车新崭崭”^{[4] (P167)}；装卸工“一条杠子一根绳，一声号子一把劲，一阵汗水一舱货，一生劳动一生荣”^[13]。

歌颂跃进气象的最终目的要归于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中国的赞美，因此，也有大量新民歌以党的领袖与政策为主题：“姑娘喜欢唱山歌，唱遍巢湖和滁河，唱得黄山点头笑，唱得太阳不下坡；姑娘喜欢唱山歌，出口就唱幸福歌，歌颂共产党领导好，歌颂毛主席恩情多”^[5]“天上的彩霞地上的花，早晨的阳光照天下；美丽的地方可爱的家，毛主席的光辉暖天上”^{[4] (P220)}“四十条象明灯照，照得农民劲头高。起身想到四十条，好跟火车来赛跑；锄地想到四十条，捐起锄头插云霄；挑担想到四十条，千斤重担象灯草；摇船想到四十条，一棹摇过十座桥；吃饭想到四十条，小菜味道特别好；困觉想到四十条，困梦头里也会笑”^{[4] (P178-179)}；“瓜不离秧，孩不离娘，中国人民离不开共产党”^{[4] (P222)}。

可以看出，所有的新民歌有一个鲜明的共同

点：洋溢着无限喜气。有的很直接地出现“笑”、“喜”、“快乐”等字词，如“公共食堂真正好，男女老少哈哈笑”^{[14] (P7)}，“歌满担，笑满担，土满担，汗满担，担的红旗云里翻，担的坝子高上天”^{[4] (P242-243)}等等。大多数新民歌则以美好的景象来表达欢快的心情。应该说，没有哪一首新民歌不赞美新中国，不歌唱新生活，不颂扬中国共产党，因此，也没有哪一首新民歌不洋溢着无限喜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民歌无一例外地属于“欢歌喜语”，是一种典型的颂歌。

小结

新民歌运动是大跃进的产物，其中不乏豪情壮志，但更多的是浮夸虚假的应时之作；其中虽然也有群众对美好生活、丰收景象的向往，然而在更大程度上它是主流话语的翻版。在1950年代“一切为政治服务”的时代背景下，文艺是政治的附属，新民歌运动当然不能例外。它以轰轰烈烈的群众通俗文化的形式渲染各行各业的大跃进，以超常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构建跃进形势下人们的幸福与欢乐，以宏大的总体性话语直白地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在新民歌的海洋里，新中国是人间天堂，只有欢乐没有痛苦，只有光明没有阴暗，只有豪情没有犹豫。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民歌是理想的产物，与现实相隔，因为现实是复杂而多面的，人们的现实体验也是千差万别的，生活中存在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的忧虑，存在着疲惫与不如意。正如有人所说：新民歌“那狂热的激情并非真实的个体生命体验与情感抒发，而是政治的巨手书写的一首大‘诗’，是意识形态笼罩下的狂欢节，它被达至极限的宗教般的意识形态力量所驱动并为后者借用为论证自身的狂欢仪式。”^[15]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徐迟. 1958年诗选·序言.
- [2] 张德生. 大搞群众运动才能多快好省[J]. 新华半月刊, 1958年第11期.
- [3] 周扬. 新民歌开创了诗歌的新道路[J]. 新华半月刊, 1958年第12期.
- [4] 天鹰. 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M].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 [5] 于明, 朱树兰. 诗歌之乡[N]. 人民日报, 1958年11月4日.
- [6] 叶林. 从司集乡看社会主义歌唱运动[N]. 人民日报, 1958年11月4日.
- [7] 杨小滨. 民间美学与极权话语——〈红旗歌谣〉及其它. <http://fzs.cupl.edu.cn/scholar/000719/04.html>.
- [8] 河北省东光县后屯村农民所作, 见《‘三臆歪’变成了‘四满意’》, 载《中国妇女》1958年第8期.

- [9] 安徽省太和县群众作, 见安徽省太和县委工作组《农民食堂好处多》, 载《中国妇女》1958年第8期。
- [10] 公共食堂好处多[J]. 中国妇女, 1958年第13期。
- [11] 李乡洲. 谈反映福建妇女生活的新民歌[J]. 中国妇女, 1958年第12期。
- [12] 黄自林. 歌唱缝纫机械化[J]. 中国妇女, 1958年第8期。
- [13] 张光年. 从工人诗歌看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J]. 新华半月刊, 1959年第1期。
- [14] 朱永富. 食堂好[J]. 中国妇女, 1958年第8期, 第7页。
- [15] 张大为. 乌托邦的狂欢: 1958年民歌运动. 粤海风(网络版), 2003年第2期。网址为 <http://www.yuehaifeng.com.cn/YHF2003/yhf2003-2-05.htm>。

A Review of the New Folk Song Movement in 1958

LI Qiao - n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23, China)

Abstract: A vigorous New Folk Song Movement surged in China in 1958. Everyone wrote poems and poem contests were held everywhere at that time. The New Folk Song Movement is a part of the Great Upswing. It is also bandsman of the Great Upswing and one of the forms of literate Great Upswing. In the content, the New Folk Songs imbue the situation of the Great Upswing in all fields. Furthermore, they extol CCP, Mao Ze - dong and PRC.

Key words: The New Folk Song Movement; The Great Upswing; The Movement of Socialism Singing

(责任编辑: 张俊之)